



广东华侨史文库

归国与再造侨乡

越南归难侨访问录

牛军凯 袁 丁 编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华侨史文库

归国与再造侨乡

越南归难侨访问录

牛军凯 袁 丁 编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国与再造侨乡：越南归难侨访问录 / 牛军凯，袁丁 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8

(《广东华侨史》文库)

ISBN 978-7-218-09468-7

I. ①归… II. ①牛… ②袁… III. ①归国华侨—访问记—中国
IV. ①K8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5755 号

GUI GUO YU ZAI ZAO QIAO XIANG — YUE NAN GUI NAN QIAO FANG WEN LU

归国与再造侨乡——越南归难侨访问录

牛军凯 袁丁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责任编辑：王俊辉 黄良起

装帧设计：书窗设计

责任技编：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 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广东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218-09468-7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37 字数：610 千

版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80517

《广东华侨史》编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朱小丹

副组长：庾 震 招玉芳 唐 豪 李 锋 吴锐成

章扬定 马建和 李 巍 张应龙

《广东华侨史》编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吴锐成

副主任：林 琳

广东华侨史文库

主 编：张应龙

副主编：袁 丁 张国雄

《广东华侨史文库》总序

广东是我国第一大侨乡，广东人移民海外历史久远、人数众多、分布广泛，目前海外粤籍华侨华人有 3000 多万、约占全国的 2/3，遍及五大洲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长期以来，粤籍华侨华人紧密追随世界发展潮流，积极融入住在国的建设发展。他们吃苦耐劳、勇于开拓，无论是东南亚地区的产业发展，还是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修建，抑或古巴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凝聚着粤籍侨胞的辛勤努力、智慧汗水甚至流血牺牲。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粤籍华侨华人政治上有地位、社会上有影响、经济上有实力、学术上有成就，成为住在国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长期以来，粤籍华侨华人无论身处何方，都始终情系祖国兴衰、民族复兴、家乡建设。他们献计献策、出资出力，无论是辛亥革命之时，还是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都不遗余力地支持、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全省实际利用外资中近七成是侨、港、澳资金，外资企业中六成是侨资企业，华侨华人在广东兴办慈善公益项目超过 3.3 万宗、侨捐资金总额超过 470 亿元，为家乡的建设发挥了独特而巨大的作用。

长期以来，粤籍华侨华人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致力于促进中外友好交流。他们在自身的奋斗发展中，既将优秀的中华文化、岭南文化传播到五大洲，又将海外的先进经验、文化艺术带回家乡，促进广东成为中外交流最频繁、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先行地，推动中外友好交流不断深入、互利合作

不断拓展，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使者。

可以说，粤籍华侨华人的移民和发展史，既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历史不可缺少的亮丽篇章。

站在中华民族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加快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关口，面对广东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奋力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的使命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编修《广东华侨史》，向全世界广东侨胞和光荣伟大的华侨历史致敬，向世界真实展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元素，也希望通过修史，全面、系统地总结梳理广东人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贡献世界的历史过程和规律，更好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为广东在新形势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型升级、进一步当好排头兵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形成强大的现实助力和合力。

编修一部高质量的《广东华侨史》，使之成为“资料翔实、观点全面、定性准确、结论权威”的世界侨史学界权威的、标志性的成果，是一项艰巨的使命，任重而道远。这既需要有世界视野的客观立场，有正确把握历史规律的态度和方法，有把握全方位全过程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抓紧抢救、深入发掘整理各种资料，对涉及广东华侨史的各方面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并加强与海内外侨史学界的交流，虚心吸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作为《广东华侨史》编修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编辑出版《广东华侨史文库》无疑十分必要。我希望并相信，《广东华侨史文库》的出版，能够为广东华侨华人研究队伍的培育壮大，为广东华侨华人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为《广东华侨史》撰著提供坚实的学术理论和基础资料支撑，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华侨华人研究做出独特贡献，并成为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品牌。

是为序。

广东省省长

朱小丹

2014年8月

序 论

牛军凯 袁 丁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越南排华，曾使 20 多万长期定居越南的华侨华人回到中国，形成举世震惊的越南归难侨难民潮。回国后，归难侨被中国政府安置在两广、福建、海南、云南、江西等南方各省区的华侨农场或渔场，迄今已三十余年。在越南时，他们曾经是越军军官、士兵、合作社干部、妇女主任、人民教师、工厂干部和技术人员，或者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或渔民，许多人已经加入了越南国籍，有的还保留着中国国籍。无论他们曾经的身份如何，回到中国后，都以一个普通的农场工人或渔民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如今，大多数归难侨和他们在中国出生的后代已经融入了新的环境和社会，然而，也有相当多人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难。今天，当我们再去了解这批归难侨的经历，重新思考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只能感叹个人在社会大背景下的无力感。

中山大学历史系长期关注东南亚区域和华南地区的研究。从 2010 年暑期开始，亚洲史研究室数位教师联合开设了“华南侨乡社会调查”社会实践课程，教学重点调研华侨农场中东南亚归难侨的生活。主要的教学方式是带领学生走向田野，从事访谈和口述调查，本访谈录就是我们数年的实践教学成果之一。我们不仅访谈了曾经的侨领、农场干部，或通过勤劳致富的归侨企业家，更访谈了为数众多的普普通通的归难侨。为全面地了解归难侨回国之后的生活，我们也采访了周边少许的非归侨普通居民，以及一些宗教和民间信仰场所。我们希望从普通归难侨的角度，了解三十多年前那场难民潮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以及他们对这场人生变局的个人感受。我们访谈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的五个方面：回国前在越南的生活、排华与回国历程、进入华侨农场与再造侨乡、华侨的跨国网络与再移民、对家乡和祖籍的认识。

下文是我们对这些访谈的一些简单总结，其中部分观点代表归难侨的主观认识和感受，而不是采访者和本文作者的学术观点。

一、华侨与华人：记忆中的越北华侨社区

1978年归国的越南华侨难民，既有来自越南北方中越边境地区的难侨，也有来自南方西贡（今胡志明市）一带的华侨。由于地理的原因，回到中国内地的南越归难侨人数远少于北越归难侨。由于历史的原因，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越南南方在美国的经援下，经济发展水平较社会主义的北方更高。特别是当时居住在越南南方的华侨华人多在西贡、岘港、会安等大中城市从事工商业。1975年南越解放、1976年南北统一后，越南政府在南方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进程还未完成之时，越南排华就骤然爆发。因此，在回国前，南越华侨比大部分的北越华侨过着更为富裕的生活。他们多居住在城市中，过着丰衣足食的城市生活，而且与西欧北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回到中国的归难侨刚被分配到华侨农场时，大多不适应新的生活，尤其是南越华侨。这种情况导致不少归难侨铤而走险、集资买船逃往港澳做新的难民。绝大多数的南越归难侨通过这一途径离开中国大陆，最终进入西欧北美，定居当地。因此，今天我们在各地华侨农场几乎见不到来自南越的归难侨。

我们采访到的越北华侨难民主要来自靠近中越边境的广宁省和海防市，尤其集中在广宁沿海农村和两大岛屿：海防的婆湾岛（越南称吉婆岛）和广宁的姑苏群岛。据难侨介绍，排华之前这两个岛上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华侨，越南人不到十分之一。我们介绍的越南华侨海外聚居地主要指这一带地区。

这些华侨家族是什么时候迁到越南的？据调查，大部分的受访者家族是在近两百年以内从广西钦州、防城一带迁入越南的，只有一两家华侨移居时间较为长久。有一家受访者说，他们家族是在数百年前从中国山东迁过去，在越南已有几十代；一位吴姓华侨家族迁移有十六代人，家谱里有详细记载。有些家族有七、八代人，一般的家族大致是三代之内，甚至仅仅只有一代人。有些家庭在北海与越南北方多次往返，躲避战乱。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解放战争时期迁入越南，美军轰炸越南时迁回北海，抗美援朝结束后又迁往越南，近似于候鸟型跨国移民。

华侨在广宁、海防一带与越南人“大杂居、小聚居”。婆湾岛、姑苏群岛虽然也有越南人，但绝大部分是华侨。有受访者说：“婆湾岛当时华侨有一万人的话，越南人只有一千人而已”。华侨常常是“聚族而居”，一位受访者说，他们家族“十六代之前便搬至越南，而且世代都保有流水簿的记录。到了我们这一代业已繁衍至数千人，撤离的时候声势极大，这些我都记忆尤深”。有一符姓家族，数百人在同一个村庄生活。这种华侨社区集中聚居的情

况，导致当地华侨长期保持中华文化传统，而没有同化于越南民族。

在教育方面，越北地区曾经存在不少华侨学校，但高中只有海防等城市地区才有，海防华侨中学的毕业生在大陆有同学会。华校的绝大部分教师是华侨，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材。华校接受越南政府的监管，并逐渐被越南政府接管。这可以从中文课程和越文课程比例的逐渐调整看出来。最初华校以中文为教学语言，每周只上一两节越文课，其后越文课程逐渐增加，中文课程逐渐减少，直至最后取消。原来的中文课教师经过培训后改教其他课程，或转岗做管理工作等。除文学之外的数理化等课程，最初用中文为教学语言，其后全部改为越文。完全的转变大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华侨讲中国方言，蛋家、渔民多讲广州话，农民多讲艾话（客家话）。由于华侨聚居地越南人占少数，所以双方沟通时多用广州话或艾话，而不是用越南语。随着教学用语中越南语成分逐渐增大，年轻人会讲越南话的人增多。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发展，越南中央及省市多有下派越南干部到基层工作，使华侨中会讲越南话的人越来越多，但越南语始终未能成为当地华侨社会的主要交际语言。

“二战”之后，东南亚地区的华侨都遇到了双重国籍的问题，越南也不例外。在南越，越南南方政权采取了强迫入籍的政策。在北越，经与中国政府沟通后，越南政府对待华侨入籍的政策是：河内、海防、南定等大城市的华侨可以保留中国国籍，其他省份、小城镇、农村的华侨要加入越南国籍，成为越南少数民族——华族或汉族。如海防婆湾岛的华侨可以保留中国国籍，而广宁省姑苏群岛的华侨基本上全部加入了越南国籍。即使如此，在姑苏群岛等地，由于华侨社区相对较大，入籍并没有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有些华侨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加入了越南国籍。入籍与不入籍的最大差别在服兵役方面，越南当时处于抗美战争和解放南方的战争年代，急需兵源。越南政府实行义务兵役制，基本上都是“二丁抽一”。没有加入越南国籍的华侨，则采取志愿兵役制度，不强迫服役。即使已经加入越南国籍，这些华侨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越南政府对他们的忠心也有怀疑，所以排华时期回国的华侨中相当多的实际上持有越南国籍。

受大环境影响，越北华侨社区没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民间信仰以敬祖为主。婆湾岛等沿海渔民社区有妈祖等信仰，婆湾的名称就与妈祖有关。此外，这一带还有南海龙王、关公、北帝、猛烈大将军等庙宇，华侨只信仰来自中国的仙人。在华侨眼中，越南人的敬祖和中国人差不多。越南人信仰一些和中国人的信仰不同的神灵，如陈大王（陈兴道）是当地影响最大的仙人，伏波将军也有广泛信仰。当地华人传说，伏波庙里有汉朝将军马援脚踩征侧、征贰夫人的塑像，越南人曾把塑像改为二征脚踩马援，结果引起瘟疫，只好

又改回来。

越北的华侨与当地越南人一直和睦相处。大部分归难侨对越北地区的越南人评价都比较相似：没有华侨勤快，但很懂礼貌，素质较好。越南人见到华侨都会亲切地喊阿叔、阿姨、哥哥、姐姐等。不少华侨认为，在讲礼貌这一方面，越南人比中国人素质要高。

二、排华与归国的个人感受

在越南南方，归难侨离开越南有社会主义改造和排华两个原因。在越南北方，归难侨是因越南排华而归国的。由于我们采访的归难侨绝大部分来自越南北方，因此我们主要讨论越北华侨的感受。可以说，直到现在，越南政府当年排华的具体政策还不是很清楚。对于每一个归难侨来说，他对越南排华和归国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把不同层次、不同身份归难侨的经历和感受综合起来，我们大概能看出那个时期越南排华的概貌。

越南归难侨基本上都是在1979年中越之战开始前回国的，但是大部分的归难侨认为，1979年之前越南政府没有公开驱赶华侨。绝大部分归难侨在接受我们采访时都说：没感觉到什么排华，看到别人走跟着走。可以说，他们回归中国，基本上属于从众心理的驱动，并非来自外界的强迫。不同的是，那些华侨中的上层，在政府工作的人员、部队的军官对排华有隐隐的感觉。

一些在越南政府和军队里工作的归难侨说，七十年代初，中越开始出现矛盾。从1975年左右开始，越共和越南政府逐渐架空了这些华侨的工作。越方采取的办法是，继续维持军政系统内的华侨干部原有的级别、生活待遇不变，但不安排具体工作，一些重要的会议也不通知参加，使之纯粹成为一种闲职。一位曾任越军军官的归难侨说：“随着排华气氛的渐渐加重，我们这些华侨军官都属于那种被半遣散的状态。工资能照领，但是开会、操练、军事活动等等，都不让我们插手了。”一些较高级的军政干部曾读到越共内部的排华文件。这些文件显示，越南政府预感到中越之间即将发生战争，担心华侨会帮助将要入境的中国军队，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以避免华侨帮助中国军队。越南政府没有计划驱赶华侨回中国，而是准备在部分山区、偏远海岛开辟一些经济开发区或集中营，将华侨集中到这些地区，避免他们与即将进入越南境内的中国军队接触联系。应当说，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一些曾在越南军队服役过的归难侨说，越北军事工事的建造、武器储藏等，多有华侨军官、士兵和一些华侨民工参与，非常了解其中的情况。一旦这些华侨协助中国军队，越军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几乎完全暴露在中国军队面前。

越南政府准备建立经济开发区并管制华侨的内部文件被中国驻越使馆了解后，中国方面首先安排一些教师、学生回国。他们回国后写信给在越家人，

告诉他们越南政府要排华，要尽早回国，中国这边有很好的接待。一些具有干部身份的华侨了解到越南政府准备在边远地区建立开发区的计划，也陆续回归中国。在学生、华侨干部回国的影响下，普通华侨听信越南政府要排华的传言，开始大批回国。期间，越南基层政府、初高级合作社干部尽力阻止这种大规模迁移的浪潮，劝阻华侨们不要回国，告诉他们不会有事，安心工作生产。越南政府为阻止排华传言，禁止那些回到中国的人再回越南。然而，越南政府即将驱赶华侨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华侨社会，任何劝说都没有意义，掀起了华侨归国的浪潮。

在大量华侨离开越南的情况下，越南政府的经济开发区计划已很难实现，最后只建立了几个很小的开发区和集中营。一位曾在集中营待过的华侨说，“在中国宣战后，越方担心侨兵会帮中国军人带路，所以把我们抓到集中营去文身，用越南语写上‘永远留念’”，以示其非越南人。既然无力阻止华侨大规模回到中国，越南政府在中越战争爆发后，开始公开驱赶华侨。所以，1979年战争的爆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越南政府驱赶的华侨主要是汉族华侨华人。归难侨们指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如瑶族等不需要回国，越南政府排的是汉族华侨华人。同时，越南政府不允许与华侨华人结婚的越南人追随华侨华人回中国，只有极少数越南人与华侨家人一起到了中国。

归难侨一部分从陆路回国，有些则自海路归国，旅途非常艰难。海路归国的主要是北部湾一带的渔民，大部分渔民全家人一起乘坐八米以下的手摇小艇回来，时间短的两三天，长的八至十天，也有整个生产队购买合作社的大渔船一起回国的。陆路回国者有广西、云南两条途径，我们采访的华侨主要是从东兴或河口两地入境。广西线或坐车、或步行到芒街，然后到对岸的东兴。云南线从海防、河内等地坐火车到老街，由于中越国际火车停开，跨河大桥上的口岸关闭，归难侨下火车从界河趟河而过，到河道中间有中国士兵迎接。由于越南政府没有公开允许华侨归国，对火车票控制严格，华侨家庭只能各显其能，想尽各种办法购买车票、上火车，甚至搭货车到老街。有的家庭买不到足够的车票，只能分批回国，家人几年后才能再次相见或团聚。

华侨归国时只能随身携带少量衣服和细软，房屋、家具、家畜、生产工具等悉数留在越南。当地的越南人在华侨归国后，搬进了华侨住房，无偿占有了他们留下的财物。因为华侨归国不是在同一时间进行。所以，常常在同一村子里有的华侨已归国，房子空下来被越南人占据；没有占到华侨住房的越南人每天等在未归国的华侨家门口，随时等候搬进去。一位华侨描写当时的情景说，“（越南人）若是看见有喜欢的房子就候着，吃饭坐在地上看你吃，平时就蹲在屋外，一直等到你走了为止。”幸运的是，因为长期共同生活和劳



动，华侨与当地越南人相处良好，这时期基本上没有发生华侨与越南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但对于当时仍未动身回国的华侨来说，这种无形的外在压力实在不堪忍受，最终大多数人选择离去。

从陆路回国的路上，归侨常能遇到越南军队，越南士兵没有进行干预。甚至有归难侨说：“越南那些军人还在路口守着，说怕地雷误伤，一直派人带路护送我们过同登。”也有归难侨说：“我们走的时候，越南警察还护送我们。”1979年战争爆发之后，不管是越南政府还是普通的越南人，都有驱赶华侨的行为。经常有越南人对尚未离开的华侨说：“中国人都走了，你们还留在这儿干什么？”对华侨态度已然发生了很大改变。这对于余下的华侨下决心回归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外在推动力。

三、华侨农场与再造侨乡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政府在中越边境建立了多个接待站，归难侨一回国即有人为其登记有关情况，进行相关安排。入境之初，政府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大约一周到一个月之后，归难侨被分配到各地的华侨农场。随着华侨进入各地农场工作，接待站也逐渐解散。北海的地角可能是维持时间最长的接待站，一直持续到1982年北海新港渔港完全建好，开始大批收容归难侨为止。

各地华侨农场接收越南归难侨人数从数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分配到哪个华侨农场，则完全是随机的。初来乍到的归难侨不了解农场的情况，农场在哪个省哪个地区，主要种植什么作物，需要做什么工作，都不清楚，农场只是按照国家的计划来这里接收归难侨。由于相当多华侨家庭不是同时回国，因此，同一个家族、家庭成员可能分配在不同的华侨农场。回国后数年内，有不少归难侨为家庭团聚而申请在农场之间调动。由于当时中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农场管理体制的限制，使得很多这种家庭团聚请求最终无法实现。

归难侨进入农场后，年龄在18岁到55岁的会分配一份农场职工的工作。按照当时的体制，他们属于国营农场全民所有制的工人，初入职时月工资接近30元。农场职工家庭成员属于城市居民（商品粮）身份，18岁以下的青少年被安排进入各类学校就读。20世纪90年代之前，超过18岁的子女都有可能在农场得到一份正式工作，成为国家编制内的农场职工，享有城市户口带来的一系列福利待遇。归难侨具有归侨身份，回国一年之内所生子女同样具有归侨身份，一年之后出生的子女不再享受这个资格。华侨农场主要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如橡胶或果树，而自越回国的归难侨以前或是种植水稻的农民，或是渔民，没有种植经济作物的经验，初入农场几年内工作非常艰辛。华侨农场的工人并不是只有华侨职工，还有农垦工人、知青、一些被农场吸

收的周边村民等，农场党政领导是由上级部门选派，部分归难侨也有担任农场各级领导职务的。归难侨与其他职工从事同样的工作，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没有差别。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归难侨与农场的其他职工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没有听说某个华侨农场中归难侨与其他职工有严重矛盾，只是初期有一定的隔阂。

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新中国接受了来自马来亚、新加坡、印尼、缅甸、印度、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的归难侨三十多万，他们大部分被安排到粤闽桂琼滇赣各地华侨农场工作和生活。至今，他们及其后代中的大多数仍然生活在华侨农场及其周边乡镇。越南归难侨是华侨农场归难侨中最大的一个群体，不少越南归难侨聚居的村庄被周围的村民称为“越南村”。在中国南方各省区，共有84个华侨农场，最早的华侨农场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华侨农场大多来源于之前的农垦农场，因为接收了大量归难侨而改制为华侨农场。华侨农场不仅是我国归难侨最重要的聚居区，而且由于归难侨带来的广泛的海外联系，日后又成为海外移民的重要来源地，成为一种特殊的侨乡。

从本质上说，华侨农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造侨乡。

众所周知，在中国，侨乡一语通常指海外华侨华人的原乡，即祖籍地。一般来说，它们是海外华侨华人祖祖辈辈生长的家乡，也是华侨移居海外的出发地和国内亲属的聚居地。历史上，这些祖籍地多为南中国沿海的乡村，特别是粤闽一带的沿海农村，但也可能是沿海大中城市。这些侨乡通常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乡音所在，从方言、物产、饮食，到建筑、民俗、信仰等等都与海外华侨华人息息相关，也因此与海外华侨华人构成多重跨国网络，生生不息。这种原本意义上的侨乡是由本地居民的跨国迁徙而自然形成的，并非人为主观意志构建而来。其与海外的联系，也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自然而然产生的，主要形成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时期。近代以来，当海外华侨回归祖国时，他们往往定居家乡，操着乡音，住在用侨汇购建的房屋里，与家乡的亲友团聚，成为侨乡中的归侨，同周围的乡民和谐相处。

但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逐渐建立起来的数十个华侨农场，却是由行政力量人为造成的特殊侨乡。这些华侨农场并非设立在归侨的原籍家乡，既没有其祖辈生活的遗留，也没有定居在此的亲属或任何物质上的原初纽带。特别是，农场所在区域的方言与归侨原先使用的方言往往截然不同，华侨农场的国有体制又造成其成为周边乡村社会包围下的一个个孤岛，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正常融入当地社会，使得归难侨缺乏对当地的认同感。这种对当地的认同感的缺失又反过来强化了他们的归难侨意识，所以当身处逆境时，他们往往会强调自己的难民身份，祈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政策上的照顾和优惠，以解决自身遇到的困难。早期，他们的国营农场职工身份使他们在面对周边乡民时，



有一定的优越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周边乡村迅速富裕起来，部分贫困的归难侨又出现强烈的失落感。

值得思考的是，这类特殊侨乡与通常意义的原生态侨乡的发展过程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来说，侨乡的产生是因为有大量居民跨国迁徙海外，并长期与故乡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另外，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乡民回归家乡定居，成为归侨。从时间顺序上说，是先有本地乡民跨国移居成为海外华侨，再有乡民从海外回归故里定居成为归侨。这一来一往，使得侨乡发展有与海外互动的因素，海外乡民特别是第一代移民和归侨往往怀有浓厚的家乡情结。而华侨农场这类特殊侨乡则截然不同，它们原本是中国南方普普通通的乡村，甚至是一片荒地，并无任何海外联系。由于政府的政策，短时间内安置了大批归难侨，从而将海外关系带进了当地。从时间顺序上说，是先有归侨跨国回归，再有部分归侨再次迁徙海外成为跨国移民。换句话说，这里的海外华侨，是跨国再移民。华侨农场只是他们移民过程中的一个中转站，与故乡有着本质的区别。由此派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华侨农场的归侨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递减趋势。而在此再次移民出国者，则很少有回归农场定居的现象。

这种再造侨乡不是政府有意识的行为，因此从一开始就缺乏通盘的考虑与周密的布局。特别是缺乏人性化的设计和打造，使之命运多舛。这种无意识再造的侨乡与通常意义上的侨乡有很大的差别：首先，它们缺乏长期存在的海外人脉网络。归侨到来时，华侨农场大都是与附近乡村隔绝的小社会，没有任何海外联系。其次，它们缺乏稳定的乡村生活。归侨由于原先在海外大多未从事过国营农场特点的农业劳作，所以回国后极不适应农场生活，不断地寻求离开的各种途径，导致华侨农场的归侨人数不断减少。再次，当地缺乏归侨的眷属和亲朋好友。华侨农场纯属无中生有的社区，并不存在侨乡固有的归侨的眷属和亲朋好友，使得归侨缺乏对当地的联系。最后，在此定居的归侨对当地缺乏足够的认同感。由于华侨农场过去的国有农场体制，使得华侨农场与当地乡村隔绝，归侨往往要到第二代以后才会认同于当地。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种由政府人为安置归侨的做法，确实使原先并非侨乡的部分区域出现了侨乡特有的现象。从原先一无所有的状态，骤然构建出一个归侨社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侨乡社会的元素。譬如与海外亲属的各种关系网络，有大量居民属于归侨，多多少少保持着与海外的联系。在特殊情况下，甚至会有一些已经移居海外的归难侨又以侨资形式回来投资捐资开发当地等等，逐渐发展出一种特殊形式的新侨乡。我们在田野考察中的新港镇和上涌华侨农场就是其中两个有代表性的实例。

新港镇位于广西北海。北海市位于北部湾北岸，与越南北部沿海隔海而

望，自民国以来一直是广东西部和广西沿海（历史上，广西沿海属于广东省，直到1965年才最终划归广西）与越南之间最重要的港口，民国年间就有定期航班与越南海防港相通。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从北部湾地区归国的越南归难侨中，尤其是渔民，相当多选择从北海上岸，北海成为了越南归难侨最重要的聚居地。七十年代末，联合国难民署经过调查之后，将北海作为联合国资助中国安置归难侨的重要地区。八十年代初，联合国为北海归难侨捐建了数十栋居民楼、造船厂、中小学校，修造了渔船码头等。在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帮助下，北海市为安排越南归难侨而建立了全国唯一的华侨渔业公社——新港渔业公社（今天称新港镇），成为一个特殊形式的华侨农场，在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新港渔业公社的归难侨主要来自北部湾地区的婆湾岛和姑苏群岛。与其他华侨农场不同的是，新港渔业公社不是搞农业和林业种植，而是进行渔业生产。新港渔业公社下设五个集体渔业公司：兴华渔业公司、建华渔业公司、盛华渔业公司、富华渔业公司和裕华渔业公司。对于来自北部湾的渔民归难侨，在新港渔业公社工作，在职业上几乎不存在重新适应的问题。新港渔业公社成立的消息传到各地华侨农场后，那些原来从事渔业、在农场不能很好适应的归难侨纷纷要求调动过来。基于当时的管理体制，只有极少数农场归难侨成功调动到北海的渔业公社。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的归难侨渔民自发前来新港镇谋生，从事渔业生产，并逐渐积累资本，从事商业服务业，使得新港镇从原来一个偏僻的滨海农村发展成为繁荣的市镇。随着新港镇经济上的发展，北海逐渐成为原北部湾归难侨的聚居地和集散地。2005年北海新港镇成立了婆湾岛华侨联谊会和姑苏群岛华侨联谊会，这两个联谊会分别是婆湾岛华侨和姑苏群岛华侨在全世界唯一的共同组织，联谊会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新港镇变成了婆湾华侨和姑苏群岛华侨心中的家乡，成为一个特殊的新侨乡。

最耐人寻味的是，北海新港镇原是一个偏僻的普通乡村。原住民本来都只普普通通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虽然世代住在海边，但是无人从事渔业与海洋养殖业。只是在越南归难侨到来后，这里才变身成为繁荣的渔港。迄今为止，本地原住民村民仍然无人下海从事捕鱼业，也不从事与渔业相关的航海、造船、码头、运输、仓储、渔获加工等行业。由于农用地基本上已经被政府征收兴建城镇，他们多依靠出租自建房屋和从事工商业、服务业为生。本地的沿海渔业和市镇繁荣完完全全是归难侨带来的；本地的海外侨民、归侨及跨国网络，也完完全全是归难侨带来的。目前镇上的人口的大部分都是归难侨及其子女，他们活跃在各个行业，成为该镇就业人口的大多数，并且不断吸引着各地归侨前来就业和定居，甚至还吸引了已经离开当地再次

移居海外的华侨的投资。原本南中国沿海的一个普通乡村，居然因政府人为的干预和归难侨的努力，在短短时间内发展成为繁荣昌盛的市镇新侨乡，这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奇迹，也给当代中国华侨农场的改制提供了一个发展思路。

江门的上涌华侨农场则走向另一条道路。上涌华侨农场原来是普通的农垦农场，文革时期又接收了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不少当时兴建的粗糙住房。到归难侨到来时，这里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原来的下乡知青，只剩下部分老职工。因农地不足且多为坡地，农场以果树栽培特别是龙眼、荔枝为主，平均每户的耕种面积都不大。周边乡村则以水田为主，是水稻主产区，也有部分经济作物种植。在包产到户后，周边乡村居民一部分进入广州、深圳、江门等大中城市打工，一部分进入当地乡镇企业务工，少数人留在农村继续耕作。这种多途径发展方式使得周边乡村经济发展在近20年明显超越华侨农场，导致继续留在农场的归难侨相对贫困化。随着户籍制度逐渐放宽，大量归难侨及其子女离开农场，进入珠三角各城市生活和劳作，剩下少数老、弱、病、残、幼留守，农场呈现出没落的景象。但是，如同新港镇一样，上涌原本是无华侨、无归侨、无侨属、无侨汇、无侨房的普通中国乡村，现在却因为归难侨的政府安置，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与华侨相关的事物从无到有，再造了一个全新的侨乡。但是，这种无根的侨乡现象与原生态的侨乡有极大的区别。由于农场经济的长期不景气，随着归难侨及其子女逐渐离开，这里的侨乡特色也在迅速消亡中。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这里又会重新恢复成为原本面貌的普通乡村。

四、再移民与跨国网络

20世纪70年代末的这场越南难民潮中，逃离越南的外侨和越南人有近百万人，不仅影响到了中越关系和中越边境，还是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从陆路，难民逃往邻近的中国、老挝、柬埔寨；从海上，难民逃往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甚至买大船漂流到澳大利亚。大规模海上逃离的难民曾被当时的世界舆论称为“船民”（Boat People），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由于接待能力有限，曾经拒绝后期的“船民”上岸。难民所乘船只，绝大部分为吨位很小的渔船，甚至是小木船，在海上抗风浪能力弱，难民漂泊海上，九死一生，据估计有数万人葬身鱼腹。这些难民绝大部分是华侨华人，来到中国大陆的被称为归难侨。

对这批大规模的难民，除中国政府尽力接待和安置外，联合国和不少欧美国家也给予了人道主义援助。香港、澳门、泰国、马来西亚等邻近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越南难民营作为临时接待场所。不久之后，美国、加拿大、英

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开始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接收这些难民。此后，除了被中国大陆安置的难民外，相当多难民转移到了欧美国家。当然，也有数量庞大的难民被香港和澳门社会接纳和吸收。逃往港澳泰马、再移民到欧美的越南难民与到中国大陆的归难侨多有亲属关系，他们与仍然留在越南的家人一起，日后形成了密切的跨国网络。

逃往中国大陆的难民中，也有不少再次移民到欧美国家。他们再移民途径可以分成两种类型：难民方式和亲属移民。以难民方式再移民的难侨主要通过港澳地区，前后大概有二批。七十年代末从越南北方走海路的难民，一部分直接开船到了港澳，一部分到了中国大陆北部湾沿岸的防城、钦州、北海等地，并有中国政府接待，但很快下海再乘船去了港澳，这是第一批离开中国大陆的越南归难侨。八十年代初，分配到各地华侨农场的归难侨，不少难以适应当地的生产和生活，又听说在港澳难民营有可能被欧美国家接收，于是集资买船从广东、广西或海南沿海逃往港澳，集资上船的资金从每人一钱黄金到多达每人半斤黄金不等，这是第二批离开中国大陆的归难侨。由于当时逃离越南的难民潮仍在继续中，所以第二次的再移民被港澳政府以越南难民的身份所接纳的不在少数，但也有相当数量被遣返大陆。据曾经参与偷渡的华侨说，“去到港澳你要穿得破破烂烂，否则就会认为你不是难民，是来自中国的。”相对于北越归难侨，来自于南越的华侨有更多资金参与集资，并且有更多的亲属居住在欧美国家，因此分配到华侨农场的南越华侨基本上都在这次移民潮中离开了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中后期，与中国大陆居民偷渡港澳高潮相伴随，越南归难侨也有一次逃往港澳的风潮。一些归难侨估计，广东沿海地区的华侨农场中，多达半数的越南归难侨曾有偷渡去港澳的经历，一些华侨曾偷渡数次。与前两次再移民相比，这次的逃离大多以失败告终，或者被中国政府半路拦截，或者在港澳难民营审查中以不符合难民身份被退回中国大陆，只有极少数人留在了港澳，或再移民去了欧美。

相当多越南难民潮中的华侨被欧美国家以人道主义理由接纳为难民，并定居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多年之后，他们都获得了欧美国家的国籍或长期居留权。20世纪90年代之后，被大陆安置的越南归难侨开始了一个新的再移民高潮，这次移民主要是通过八十年代初移民到欧美的难侨以亲属移民方式进行的。这种跨国亲属网络推动了越南归难侨的海外联系和再移民，尤其是较其他人群更多的跨国婚姻，跨国婚姻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群体更密切的跨国网络联系。在我们调查的越南归难侨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家庭都有海外亲属。海外亲属给大陆近亲寄来的侨汇在八九十年代作用很大，不仅改善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有些侨汇更是他们移居城镇从事工商业服务业的原始资本。近年来，随着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侨汇的作用和影响已经大大降低。